



YUYAN JIAOJI SHUNYINGLUN

语言交际顺应论

—— 谢少万 著 ——

民族出版社



YUYAN JIAOJI SHUNYINGLUN

语言交际顺应论

—— 谢少万 著 ——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交际顺应论/谢少万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 - 7 - 105 - 13551 - 6

I. ①语… II. ①谢… III. ①言语交往—语言艺术—研究
IV. ①H019



中图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0304号

策划编辑:虞农

责任编辑:向阳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址:<http://www.e56.com.cn>

印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200千字

印张:6.75

定价:20.00元

ISBN 978 - 7 - 105 - 13551 - 6/H · 945(汉30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大地、人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洪堡特

前 言

语言顺应论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 作为一种语言顺应理论的语用学 (pragmatics as a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 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 Jef Verschueren 创立的一种语用学理论。早在 1985 年, 维索尔伦 (Verschueren) 在国际语用学研讨会上, 明确提出了语用学是关于语言的一种综观的观点, 认为语言的使用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人类生活中的认知、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语用学应该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综合角度对语言现象进行综观研究。1999 年又以专著的形式即《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系统呈现了该理论, 标志着该理论走向成熟。

语言顺应论研究在特定语境中话语的生成与理解, 探讨语言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认知、社会及文化诸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语言顺应论强调语言交际的过程是不断地进行语言选择的顺应过程, 这些选择可以发生在语言组织的各个层面, 包括语音、形态、句法、语义等。语言使用的顺应过程, 不仅需要顺应交际意图, 而且需要顺应交际环境。

语言顺应论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交际者为达到交际目的而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选择之所以能够进行, 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的

顺应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描述和解释：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这四个方面构成语言顺应方法论中的一个统一体。语境关系的顺应和语言结构的顺应规定了顺应的范围，即言语交际中的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的综合。顺应的动态过程是语言的选择过程，亦是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因人们对语言顺应的意识程度的不同而影响着语境和语言结构关系的变化。

本书的目的在于向广大读者引介英、汉中日常语言的顺应现象，涉及顺应理论的主要议题、基本概念、基础理论与原则，让读者感受日常语言交际中丰富的语言顺应现象，逐步学会从认知、文化及社会的角度观察、思考、分析这些现象。因此，本书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既对相关理论及其渊源做深入广泛的挖掘，又结合理论导入，对顺应理论的基本原理及主要概念进行全面的剖析和例释，深入浅出，避免抽象、教条的说理。同时，注重选择与日常交际联系密切的典型议题与事例，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有的放矢，针对性强。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导论”，主要回顾人类有史以来语言交际理论的发展脉络与轨迹，目的是向读者介绍人类语言交际理论的诸多模式及其理论基础与历史渊源。第二章“语言交际的本质特征”，主要讨论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交际的内涵、要素、类型、功能与作用，目的是让读者对人类语言交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三章“语言交际的语境制约”，主要理顺古今中外语境研究的发展过程，阐述语境对语言交际的功能与作用，目的是让读者懂得如何结合语境把握好语言交际中大量存在的非字面信息，明白说话人不直接提供言外信息的主要原因。第四章“语言交际的认知维度”，主要分析语言交际中话语的生成与理解的心理过程，系统介绍了语用推理的方法、步骤与程序，目的是让读者学会如何透过话语的明

示内容去揣摩、判定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意图。第五章“语言交际的社会观察”，主要探讨社会与语言交际的关系，说明社会与语言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道理，阐发了社会规范、社会心理等制约语言交际的重要因素，目的是让读者明白社会心理、社会规范对语言交际的发生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六章“语言交际的文化视角”，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语言交际，去探究文化与语言交际同质同构现象，探明文化与语言交际的辩证关系，探析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目的是让读者去感悟、感知相同的话语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包蕴着不同的隐含意义与文化内涵。第七章“语言顺应的理论性研究”，对顺应理论的主要内容、基本原理、顺应理论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剖析与发掘，对顺应理论的主要概念也做了全面的阐发与例释，目的是让读者对顺应理论及其相关概念能有一个清晰的、准确的理解与认识。第八章“顺应理论的应用性探讨”，立足讨论顺应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主要探讨顺应理论视角下如何进行外语教学、翻译实践及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的研发，目的是让读者懂得顺应理论是解释力极强的理论，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第九章“顺应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主要对我国二十多年来顺应理论研究的状况进行历史性的审视，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及观点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归纳与评价，对我国顺应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也做了客观的评说。第十章“结论”，主要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探讨语言顺应与认知、社会及文化的辩证关系，探讨人类、语言、客观世界三者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回答了人类生存、生活与发展的哲学问题。

本书的读者对象包括高校英语专业三四年级学生、中文系语言学专业学生、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以及其他语用学爱好者。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周流溪教授，感谢他多年来对我

的指导与教诲。感谢他在百忙之中为拙作作序。2001年，我师从周流溪教授做访学研究，专攻顺应理论，期间一次又一次得到周教授的指点，一次又一次受到启发、醒悟。再次感谢周教授的提携。

本书是顺应理论的专著，涉及语言学、哲学、认知科学等学科及诸多方面的议题与现象，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同时，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恰当甚至错误的地方，恳请各位专家、同行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谢少万

2013年12月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序

语用学的宏观、综观和深观

北京师范大学 周流溪

谢少万教授近日以其所著《语言交际顺应论》书稿示我，嘱为之序。我披览之下，觉此书胜义甚多；今姑略陈数言，与作者和读者共同探讨。少万同志于2001年秋至2002年夏在北京师范大学从我访学，当时他已集中关注语用学和顺应理论。在互相切磋中我也支持他继续沿此方向深入研究下去。

此书是目前国内最全面阐述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顺应理论的著作。全书共分十章，除导论和结论二章之外，具体讨论了语言交际的本质特征、语言交际的语境制约、语言交际的认知维度、语言交际的社会观察、语言交际的文化视角、语言顺应的理论性研究、顺应理论的应用性探讨、我国顺应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导论中介绍了现代语言交际理论的历史渊源，按发展顺序分别列举了语言交际理论的代码模式、推理模式、明示—推理模式（关联理论）、顺应模式，并说明了语言交际理论的哲学基础。在这个总体论述框架里，作者把顺应理论置于语言交际理论诸家学说的大背景下进行观览和对比，揭示了顺应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横向联系，凸显了顺应理论的要点和长处。

维尔舒伦（Verschueren）提出的顺应理论（Theory of Adaptation）有两重意义：它既为语用学做出了学科定位，又阐明了语言交际的基本原理。莫里斯（Morris）在最初提出语用学概念时指出：

语法学研究语言符号之间的（组织）关系，语义学研究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向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语言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他的所谓语法学（syntactics）、语义学、语用学都不是纯语言学学术术语而是符号学术术语，可以理解为结构学、意义学、效用学。此外，这样一个三角关系定义也不是必然意味着语言学有三个平行的分支学科；对言语效用问题的研究也可能被理解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几十年来，很多人倾向于认为：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是语言学的几个基本组成部分；语用学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的语言学教材（尤其是中文系使用的语言学教材）里也就不时出现所谓语言体系有四部分或五部分的分歧说法。国际上则存在激进语义学（语用学是语义学的一部分）和激进语用学（语义学是语用学的一部分）之争论。利奇曾经调和两种意见，提倡普通语用学（包括语用语言学和社会语用学两个部分），重点是从会话原则来研究语言交际。他虽然承认语用语言学，却将规约含意（如英语的 but）、语用助词（如德语的 ja）和指称词语的使用，都置于边缘地位。其实含意问题与语用推理直接相关，而推理又与认知相联。利奇强调的是社会语用学方面。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语用学界开始汲取来自这方面的灵感而趋向构建认知语用学了。

把语用学视为同语音学、语法学等（依托“语言资源”之学科）平行的分支学科（部门 component），就会寻找语用学的“基本单元”并立足于那些单位来开展研究。这种研究带有微观研究的性质；英美语用学者很多人走的是这条路线——它广泛流行于 20 世纪的结构语言学（Lyons 和 Lepschy 所称的结构语言学）。而欧洲大陆很多学者（像 Verschueren 和 Mey）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们要从语言使用的全方位角度来考察语言学，所以他们的语用学是一种宏观的语用研究。它又被称为“综观”的研究——“综观”不

光强调综合观察，而且其实更是强调语用学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种视角 (perspective)；它是一种透视性的观察角度，因为“任何(部门的)规则在实际使用时都会以某种行为来操作；由此观之，一切规则中皆有语用成分”。(Verschueren 引 Morris 之语。)而 Lyons 是英国学者中持这种综观立场的少数人之一，他早就说过用较为实际的方法来研究语言(语用)跟用较为抽象方法的结构语言学之间其实并无对立之处。但用这种务实的方法当然不是仅仅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语言交际(包括跨语言交际)的环境、语言的各种实用领域、语言和意识形态、语言理解的推理等，都是语用学要关注的问题。

Mey 曾在其语用学著作中提出总体上的交际原理 (communicative principle)。这可以理解为：一切言语行动 (speech acts) 都以达到社会交际的总目标为宜：人们说话时怀有交际意图，这是一切言语行为的基础。这是默认的道理。Mey 认为：交际中说话总得有一定的意义，所以 Sperber & Wilson 所提出的关联原则可以视为交际原理的一个变相体现——交际的最简理论就是：交际只需要一条关联原则。

语用原则总是服务于社会行为原则。中国古代一些(虽然可说还属于语言交际理论萌芽的)语用思想，其实已经对此有相当好的表述。

《老子》(27章)提出“善言，无瑕谪”(善于言谈，无可指责)。怎样善言呢？他说(23章)“希言自然”(少说话是合乎自然的)；又说(5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议论太多，注定行不通；还不如保持适中)。可见所谓善言，或许有多种方式，但多半是少言(少说少错，多说多错!)。这是老子之基本的语用原则。老子之所以信守这样的语用原则，乃是因为他提出的道学之核心思想是“无为”：那既是哲学信念，也是社会学信条；但其消极

保守的倾向是明显的——做得最好的时候也只是守中。

孔子说：“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矣”。现在大家倾向于认为：这相当于合作原则（CP）里的真质准则和适量准则。其实不尽然。后一表述（见《论语·卫灵公》，旧注已解为“凡事莫过于实”“不烦文艳之辞”），又像是和道家之保守的少言原则差不多。但按“达”字原义仔细寻绎便知道：其实它并非说“言语能表述清楚就行了”，而是说“言语能使人明白理解就行了”。显然，要使人明白理解，就要顺应交际之环境和人的社会因素；而且，还要考虑听话人的认知因素（即要让对方通过推理而了解发话人的交际意图）。更质言之，对“辞达而已矣”还必须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进行阐释！

现在来看前一表述。它出自《周易·乾卦》九三的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文言》解：“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爻辞和文言之阐释的大意是：君子始终保持自警自励的勤奋“进德”状态，注意妥用言词来确立其诚信，以此来避免过失、保其功业（孔颖达疏说修辞是“修理文教”，恐未必是）。不管怎样，“修辞立其诚”又是暗示言语行动要顺应社会活动的需要。

我为什么引用古代的例子说这一番话呢？因为这些表述的义蕴还有待于我们的阐发，更因为我们应该利用本族语的资源来构建自己的语用学理论——所谓本族语资源又必须从根底上发掘、由古及今一并收揽。举凡道、儒、墨、名、法诸家的经典里（包括纵横家、政治家的言论里），都有语用学、修辞学（和辩论术）、逻辑学的珍贵材料，而这几种材料往往是杂糅在一起的。——这种杂糅现象不光在古代中国存在，在古代印度、古代希腊也是如此。但我们且不忙责备古人不能明辨学科内容。我们先要承认：在现实的复杂生活里多数人们只按实际的临时需要去使用语言，并非事先就时

刻想着“我要从某某学科的观点出发来思考、来说话了”。当然，冷静的、缜密的、专业的头脑也有用处。我就曾留心古人言行中显现的语用学问题，试图主动发现一些语用原理。

1999年在重庆举行的全国语用学会议上，我的发言谈了指称词语的语用学地位及其使用准则（后以此为题写成论文，载于我2001年的论文集《语言研究与语言教学》）。在这个发言里我提出并阐述了语用学的规避准则（maxim of avoidance）。我使用的材料都是本土原材料，包括取自十三经里的语料。这条准则（我为稳妥起见暂不称之为原则）看似同礼貌原则有关，实则它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不能说它是从礼貌原则派生出来的。它可以与礼貌原则相联系，但也可以与社会语言学的一条原则（姑且名之为避讳原则 taboological principle）相联系。避讳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但古代不能直呼帝王、鬼神之名，现在也还有要避讳的事物。轻者，中国人的习惯一般不会直呼父母师长之名，出于某种微妙考虑也仍会避免提及某人某事。连人称代词的使用也很有特点：不仅慎于说“你”（tu, thou），也不一定说“您”（vous, you）；而要用名词性的指称词语。“我”也少用，而径用己名，或说“仆”（your obedient servant）。重者，许多事情要避免谈论就更不必证明了。这真是一个与社会活动和意识形态等等有紧密联系的语用现象。

我在编写《唐诗三百首韵编》（2008）时，提出了语用学的最大信息〔量〕原则（principle of maximal information）。例子是开卷首页便见的皎然《寻陆鸿渐不遇》：“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诗中重复了“来”字，不够完美。但是我却看到另一个文本，作“归时每日斜”。我觉得这个文本是正确的。所以我说重复“来”字不完美并非只凭主观判断，我有异文的根据。皎然有诗学著作两种，我相信他本人会自觉地炼字锻句。但为什么

这诗重复了一个字，就显得不够完美呢？因为它浪费了一个字，即没有让诗中每个字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诗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体会到：应该恰当用字并尽量使每个字都充分发挥其表达功能；而这条修辞原则随着诗律从宽到严也就慢慢成为风尚了。在汉语诗律建立的过程中，通过佛教东传而来的梵语诗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的要义之一是强调要避免“诗病”。所谓“病”（doṣa），是指各种语言上和风格上的不完备之处。声病的门类很多，传到中国就成为沈约之流的“四声八病”理论（它直接导致了汉诗格律的形成）。语法修辞方面的“病”也很多。很古的印度戏剧论著作《舞论》提及的诗病就有“意义重复”（重复表达一种意义）和“意义累赘”（描写不必描写者）。唐时来华日僧遍照金刚所著《文镜秘府论》保存了大量中土久佚的（受自梵学的）诗学和辞章学文献。通过了解这些学说，结合我自己长期自觉学习和写作诗文的经验体会，我觉得有足够的根据提出语用学的最大信息量原则。

在语用学里还有很多仍待深入探索的问题。我们应该抛弃传统上不重思辨的习惯，勇于参与学科理论的构建。我们尤其要重视从本土资源入手，要贯通中外，不能只跟着外国人打转转。从这个角度来看，徐盛桓教授做得较好，他在如何认识语用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路线方面提出过很多真知灼见，包括一个以常规关系为基础的语用推理之心理模型。他的《常规推理与“格赖斯循环”的消解》一文之见解很有探索精神和理论价值。钱冠连教授除率先写出自成系统的《汉语文化语用学》专著外，也曾反复论述要重视语用学的哲学思考和学科体系、研究路向等根本问题。

但就在我们重视宏观微观之分的同时，又不能忘记（如徐盛桓曾提请注意的）语用学还存在社会交往路向和认知路向之分：Verschueren 的顺应论属于社会交往研究的路向。我也清醒地注意到这

个问题。所以在我的博士生樊玲选题时，她原想继续其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礼貌原则）做下去。我不同意她做旧题目，也因为那种研究是社会语用学。而当下的新趋势是认知语用学，所以我要求她转而研究认知语用学。我指导论文时都让“弟子各从其志”。但这里其志的接纳，已体现于语用学了；具体如何做，我还要有一点约束。樊玲的选题是《推理的认知语用研究》，很难做好，因为它要求很高的思辨。现在她通过极大努力，我们也反复磋商，而达成了这样的认识：认知语用学的重点或核心是推理理论；她在论文里要构建一个（结合认知语言学的）语用推理学说之完整的理论框架：语用推理是交际双方心智过程的动态整合，包括交际的意向性、理性、概念化、动态语境之间的整合、隐喻之类策略的运用和理解，等等。

就认知语用学而言，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建立在 Grice 和 Searle 的言语行动和含意理论基础上的）早期推理理论如“新格赖斯学说”、Sperber & Wilson 的关联理论、最近的认知推理理论（如 Kasher、Kecskes、Bara 等人之说）。认知推理学说是认知语用学的第三阶段（若从关联论算起是第二阶段），是一种深化研究，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结合。有人说结合认知语言学的语用研究是微观研究，这不准确。我在指导樊玲写作其博士论文时，曾明确指出：认知语用学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结合；它可说是一种深观，而深观不仅是微观。樊玲论文的新意之一，在于充分考虑明说的和隐含的话意之动态结合，也考虑了理性和语境的复杂作用。针对（新）格赖斯理论仅以发话人为中心、关联理论仅以受话人为中心的偏向，樊玲的论文将发话人和受话人双方都考虑进去；另外不仅探讨交际成功的推理，还探讨交际失败的推理。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有人指出：关联理论不能（很好地）处理文化和社会语境，对于语言使用之更有社会意识的领域（语域、

风格等)的解释明显不足。徐盛桓也认为关联理论还不够。他在《认知语用学研究论纲》一文里指出:“一个学科的建立,要有能体现自身学术品格的研究对象、理论目标、概念体系、理论建构、主要研究方法等。”他对认知语用学的研究做一个初步的提纲式的勾勒。王寅教授近几年从语言是身心一元论的产物之基本观点出发尝试全面构建认知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包括认知语用学和“新认知”语用学(社会认知语用学或认知社会语用学)。我给樊玲明确提出的论文要求也是要敢于思辨,不能限于关联理论,而要超越之。比如,我们就曾在理性问题上反复讨论。不过,我们认定之新的认知语用学(new cognitive pragmatics)不是“社会认知语用学”或“认知社会语用学”。

现在回到顺应理论。在认知语用学的新视角看来,如何评价顺应论,是一个问题。刊物上曾有戈玲玲《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兼论语用翻译标准》一文,介绍了(Wilson的弟子)Gutt把语用学即关联论引入翻译理论的贡献,又联系顺应论来审查翻译实践。关联论和顺应论能搭得上界吗?若按Mey的说法,关联论既然作为交际原理的体现,那它同顺应论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样从社会性视角来看关联论,也不无道理。

钱冠连在《PRAGMATICS 九年首文研究》一文中引Katsuya Kinjo的话指出:“人们以话语做事不一定局限于Searle所认识到的言语行动。”那么语言顺应的运用也同样还会有很多仍待解释的领域。谢少万此书颇能关注顺应理论的应用方面。这是应该的,反映了学者们结合实际积极运用顺应论的行动。国内学界已多有与此相关的研究。例如除此书所列举者外,李占喜《英语“写长法”的语用顺应论研究》《顺应论:文学翻译的一个新视角》二文便也都是顺应论在应用语言学园地的新成果。说到翻译问题,莫言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翻译者功不可没;而其翻译可不是字句“对等”的

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衍译”（这是我自造的术语，可对应于 paraphrasing translation，见我在2013年5月同济大学“从泰戈尔到莫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未刊）。衍译符合语用顺应论的精神，往往能很快见效。严复式的衍译就曾大获成功。见效，是重要的。这不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实效主义（pragmatism）。当然，其他翻译方式方法，包括直译，也各有其用场。

我们在对待古代修辞学遗产时，必须认识到修辞学本质上就是语用学；至少可以说：修辞学包括原则和技术两部分，原则部分就是语用学。今天，必须以语用学的眼光来看待和重审修辞学，以语用学的原理来拯救和发展修辞学（说拯救，是因为外国和中国都曾把修辞学搞得越来越琐碎越来越烦人），首先是挖掘和弘扬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和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些雄辩家的修辞学遗产即语用学思想。当代西方文论里提出叙述（叙事 narrating）就是修辞，这是有道理的；而修辞也就是社会行动。这里存在着三位一体的现象。所谓社会行动，就是以言为行、言行（言语和行动）一体。我上面所说到的古代事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现代也一样。

这样说来，社会语用学也永不可废。王寅就曾建议国内同人注意 Habermas（1981）具有哲学思辨性的社会交往理论“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当然，能在社会认知语用学的框架内来经营也很好，甚至更好。我们期待社会、认知这两方面的语用研究都不断出现新的成果。我们也期待谢少万教授在语用学和其他领域之研究中做出新的贡献。

2013年12月30日于北京